

盛世遗珍

法门寺与大唐文化瑰宝

展览中文解说

“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和唐墓俑

唐代的墓室中一般放置各式各样的物品，供往生者在冥间继续使用。当时的繁荣景象促使了盛唐的厚葬风气；墓室中不仅绘有壁画，还有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唐代贵族的墓室因此成为了一个齐全完备的空间：往生者有侍从伺候，也可享有娱乐活动，周遭有山水风景，连宇宙气象和超自然的元素也纳入其中。

陶俑是唐墓主要的随葬品之一，其造型包罗万象，包括了镇墓俑、出行仪仗队伍、侍从、家畜和胡人（当时对汉族以外的人的笼统称号）。唐代陶匠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想像力营造出丰富多彩的地下世界，制作出形形色色的陶俑。8世纪时期，制作陶俑的工艺已达到了成熟鼎盛的阶段，陶俑的造型亦变得更生动，体积也较为庞大。

陶俑是唐代艺术中重要的文化瑰宝，它们不仅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面貌，也让后人有机会认识唐朝当时的风土民情。

陶俑是唐代艺术中重要的文化瑰宝，它们不仅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面貌，也让后人有机会认识唐朝当时的风土民情。

【展柜1】
跪拜女俑
745年
彩绘陶
1955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经过工匠的巧手，这尊陶俑展示了当时人们行跪拜礼时的神态。妇女的神情庄严崇敬，而她身上裙摆的皱褶，亦灵巧地表现了跪拜的动作。唐代陪葬的物品当中，极少出现这一类造型的人像。这一陶俑造型里的妇女正在行肃拜之礼。这种跪拜的形式用于媳妇初见家翁或是宫女晋见皇帝皇后等特殊场合。

胡人武士俑
约648年
彩绘陶
1985年咸阳市顺陵窦诞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代工匠在打造陪葬物品时，多以其千变万化的造型享誉中外，但在制作非汉族的人物造型时，却不免落入窠臼。例如这一胡人造型的陶俑，神态威武彪悍，便是一般刻画非汉族人物的方式。胡人（往往指来自中亚的非汉族人）多以魁梧壮硕的身形著称，故也被视为保护墓穴的最佳造型。此陶俑来自窦诞（580至648年）的坟墓，窦诞是位将军，同时亦是唐高祖之女襄阳公主的驸马，其墓中的陪葬品超过250件。

卧狗
或为7世纪
彩绘陶
1953咸阳市底张湾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牛
或为7世纪
彩绘陶
1948年西安市长安县嘉里裴氏小娘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明器当中经常出现各种动物造型的陶俑，例如牛、羊、猪、鸡、狗等家畜。它们的造型朴实生动，往往比一般的陶俑造型来得更为小巧。

文官俑
8世纪
彩绘陶
2003年西安市长安区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文官造型的陶俑多表露谦卑恭顺的神态。此陶俑双手抱拳、听候差遣的造型亦呈现这一神态。

【展柜2】
马
约741年
彩绘陶
2000年蒲城县惠陵李宪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胡人牵马俑
8世纪
三彩釉陶
2002年西安市长安县郭杜乡唐墓出土。西安博物馆

骑马男俑
约664年
彩绘釉陶
1971年昭陵郑仁泰墓出土。昭陵博物馆

马是唐代艺术中深受欢迎的题材之一。除了军事需用马，出行时亦得用马，而传达指令、讯息、书信等也需快马速递，甚至是贵族狩猎、打马球等，皆是在马背上进行的活动。故此，许多贵族与皇室的墓穴里，经常可以看到不同造型的马俑。

唐朝是唯一成功驯育马匹的朝代，这可能与他们拥有西北民族文化根源以及和边疆游牧民族通婚有关。唐朝多依赖来自中亚地区的驯马师，他们一般蓄着大胡子，身穿衣领向外的长袍。

驮货骆驼
7世纪下半叶或8世纪
陶
1991年由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文化馆移交。西安博物院

驮架骆驼
7世纪下半叶或8世纪
陶
西安博物院

骑骆驼男俑
8世纪
陶
1956年咸阳市底张湾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穿梭于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旅人和骆驼常被纳入陶俑的造型中，反映了唐代社会对该动物造型的喜爱程度。唐墓里所发掘的骆驼陶俑主要刻画来自中亚地区的双峰骆驼，这种骆驼不畏峻寒、亦能驮运重担。骆驼不仅是往返丝绸之路的交通工具，骆驼肉以及骆驼奶亦可食用。不同外地商人造型的陶俑一般也会伴随着墓葬中的骆驼俑。

【展柜3】
文官俑
8世纪
三彩釉陶
1986年西安市东郊庆华厂出土。西安博物院

七世纪下半叶的陪葬陶俑多采用“三彩”技术，而通过低温铅釉烧制的陶器色泽明亮鲜艳，也更为耐久，所以深受欢迎。

【展柜4】
镇墓兽
约666年
彩绘陶
1990年礼泉县韦贵妃墓出土。昭陵博物馆

这些陶俑在七世纪下半叶盛行，制作时，工匠一般上也采用彩绘、贴金等技术以让陶俑的造型更美观，亦可衬托墓主高贵的身份。此彩绘镇墓兽是唐太宗妃妾的陪葬品之一，而这位妃妾是属于当时唐朝贵族之一的韦氏家族。

【展柜5】
十二生肖俑
或为8世纪
陶
2002年西安理工大学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代和宋代时期的墓穴常以十二生肖俑为陪葬品，作为辟邪、保护墓穴的守护神之一。其摆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放置在墓室两侧的壁龛中；另一种是置于墓室的四周，按子南午北的顺序排列（即十二生肖之首的鼠置于南方，而排第七的马则在北方）。以十二种动物形象代表十二地支的陶俑盛行于唐朝。这回展示的十二生肖陶俑是身穿文人服饰、兽头人身的造型。

【展柜6】
天王俑
7世纪晚期或8世纪
三彩釉陶
1987年西安市半坡饭店基建工地出土。西安博物院

在佛教的世界观中，四大天王（梵文：lokapala）是四方的守护神。因此，寺庙和坟墓中大多会置放天王俑。自七世纪中叶，人们已不再置放武士俑，而改用天王俑来象象征墓穴的守护神。这些天王俑一般都脚踏恶鬼，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隔邻的展柜中所展示的天王俑应为北方多闻天王（又名毗沙门天王）。

【展柜7】
天王俑
7世纪晚期或8世纪
三彩釉陶
1956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镇墓兽
7世纪晚期或8世纪
三彩釉陶
1966年来自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出土。西安博物院

【展柜8 — 隧道两边】
镇墓兽一对
或为7世纪上半叶
彩绘陶
1991年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一般而言，墓室入口处或隧道都会放置成对的镇墓兽。初唐时期的镇墓兽设计大体都比较简单。此外，成对的镇墓兽有时会有一件为人面兽身的造型。

【展柜9 — 隧道左边】

唐代时期，佛教盛行，其影响力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皇室贵族到平常百姓，善男信女纷纷聘请工匠制造各色佛教物品，以示虔诚。这使得唐代佛教艺术蓬勃发展。

佛头像，7世纪或8世纪早期，1984年西安市南郊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佛头像
或为7世纪或8世纪早期石
1984年西安市南郊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白石佛头，7世纪下半叶，1963年潼关县老虎城村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这个白石佛头出土自唐玄宗寝宫兴庆宫遗址。额头凹陷处原应镶有宝石，而头顶处原本可能置有一尊小型佛像。

佛坐像，7世纪下半叶，1963年潼关县老虎城村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佛坐像
或为7世纪下半叶石
1963年潼关县老虎城村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善业泥：菩提树下的成道佛陀与二菩萨
唐（618—907年）陶
1979年西安市文物商店移交。西安博物院藏

善业泥四件：佛陀与佛塔，7世纪，1953年征集。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善业泥四件：佛陀与佛塔
唐（618—907年）陶
1953年征集。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善业泥像，7世纪，1953年征集。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这组善业泥像是使用铁制或木制的模具制作而成。模压成形后，工匠一般会将之放入窑炉烧制，只有少部分善业泥像是自然风干使之硬化。这类使用模具大量制造善业泥像是佛教造善业的方式之一。

大型善业泥像的背面印有“大唐善业泥 压得真如妙色身”12字，显示出其本身的特质，即作于唐代的善业泥，由压塑佛像而得到佛之真身。

佛印模
797年铜
1960年征集。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这个由唐代宦官何敬仙出资铸造的印模是目前在中国发现时代最早并带有铭文的佛像印模。从印模背面的铭文可知，正面为阿弥陀佛，外围为八位手持莲花的菩萨，中央还有金刚界五方佛。这种复杂的组合排列方式是受到佛教灌顶仪式的影响。在这种仪式上，初信者的头上被喷洒净水，以坚定其信仰。印模外围的八座宝塔则是象征着循序渐进的悟道过程。

佛像印模袭承中国和印度传统。在中国，印章最初用于鉴别官方文书的真伪，确定用印人的身份。由于印章代表着权力，故被宗教活动所借鉴，成为佛法的象征。

狮形香薰
9世纪中期石
1955年西安市灞桥区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蹲狮
唐（618—907年）石
咸阳市文保中心藏

狮子于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时期从西域引进中原地区，并因其雄伟的姿态和其宗教意义而受到民间艺术家的青睐。狮子被视为佛法的守护者，因此常被刻画于佛教造像中。

佛造像四件，7世纪，1993年长武县昭仁镇东关村出土。长武县博物馆藏

【展柜10 — 隧道右边】
佛教造像四件
7世纪铜鎏金
1993年长武县昭仁镇东关村出土。长武县博物馆藏

这四尊神像与其他39尊佛教造像一同出土。这组造像包括12尊佛祖造像、26尊菩萨造像和一尊守护神。中国北部常出土这类佛教造像。这些造像应当在南北朝末期或隋唐初期的信众为了避免其受到毁坏而埋入土中。

展柜中的两尊铜像为佛祖造像，而其它则为菩萨造像。

法门寺
坐落于西安市西100余公里的法门寺以所珍藏的佛陀舍利著称于世。虽然舍利也藏于中国的一些其它佛教圣地，但唐代的帝王们对法门寺的佛舍利尤为重视。寺院由大唐的建立者高祖李渊命名，意为“众法之门”。

唐代帝王定期迎请舍利入宫供养。佛指舍利被称为佛之“真身”。迎奉舍利的仪仗往往使信徒们激动不已，甚至引发一些自残身体的行为。每逢舍利回归法门寺塔下之石室，都会有新的供品奉上。寺院和宝塔也会定期维修扩建。

建立定期迎奉舍利制度的原因迄今仍然众说纷纭。诚然，有些皇帝笃信佛教，被奉为菩萨在世，但皇室对舍利的重视也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在某些情况下，皇帝病危时也会通过迎奉舍利来祈求健康平安。

法门寺塔基底下石室中的四枚佛指舍利，7世纪，1987年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宝塔之下
法门寺石室

1981年8月，法门寺真身宝塔在一场淫雨后坍塌。为重修宝塔，考古工作者对塔基进行了发掘，由此展开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大发现。在塔基底下几个封锁的石室里，尘封千年的珍宝重现于世，其中包括石塔、天王像、稀有的瓷器、来自中东地区的琉璃，以及精美的金银器皿。有些器物明显具有宗教功能，但其中也不乏宫廷使用的奢侈品。同时发现的还有四枚佛指舍利。

法门寺塔基底下的石室充满了神秘感，没有任何单一的理论能够解开所有谜题。地宫（石室、秘龕、踏步漫道和隧道的统称）于公元874年被封闭，其中大部分物品是懿宗和僖宗两代皇帝的供养，但也有不少器物属于更早的时期。

四枚舍利被置于不同的石室中（如图所示）。有观点认为，前三枚舍利是为防范盗掘者和灭佛运动时的摧毁而制作的“影骨”，而真身舍利则被藏匿于最后一间石室北壁底下的一个小型密龕之中。然而，这种说法的论据并不充分，盛放其中一枚“影骨”舍利的八重宝函在地宫的《物账碑》中赫然在列。由于唐代的皇帝们将法门寺视为皇室的内道场，故而地宫的设计蒙上了浓厚的皇权色彩。有些皇室成员将他们的发绺或木质雕像放置于真身舍利之侧。这种特别的举动是否是想借助舍利来确保皇权的稳固，抑或是皇帝本人寻求永生的一种方式？

石室中的珍宝
统治者们常常在公开场合举行宗教仪式和集会，并藉此机会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迎奉法门寺舍利的活动，以及皇家对寺院的慷慨供养，都在向世人昭示皇帝的虔诚恭敬。

许多从石室出土的器物上都带有与佛教密宗相关的符号和造像。密宗在唐代由印度传入中国，其仪式和咒语以秘密的方式师徒相传。密宗（又称“金刚乘”）备受朝廷的青睐。在皇室的资助下，一些新的寺庙得以建立，许多经书翻译成汉文。然而，密宗并未真正形成一个严格的教派，密教和显教的仪轨往往同时存在。

法门寺石室中所发现的许多器物都是供皇家使用的珍品。其中有数量众多的熏香和纺织品。有些器具是品茶用具；茶在当时既用于辅助禅定修行，也是日常生活中广受欢迎的饮料。所发现的琉璃器皿多数来自中东地区，它们的出现印证了当时人对舶来品的重视。鎏金银器向人们展示了唐代器物各种造型和风格。有些器物出自中国南方地区，人们普遍认为那里的匠人技艺超群。

【展柜11】
顶棚装饰
871年银鎏金，木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这件由鎏金镂空银花瓣组成的莲花式装饰，原先悬挂于后室的顶部。装饰的中心原本附有一面铜镜，而这两者则连接着刻有花瓣的汉白玉盖石，组成一体作为藻井。

木板上墨书的发愿文称此物件为“宝帐镜花”，由“弟子崔庆”供奉。石室应由油灯照明，镜子助于反射油灯所发的微光。将镜子系在石室顶棚的作法也可见于其他唐、宋塔基底下的石室。

【展柜12】 **阙伽瓶**874年之前银鎏金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地宫后室的角落里发现了四个一模一样的阙伽瓶，此为其中之一。瓶上饰有十字交叉的金刚杵纹，象征着佛法不灭。

这四个阙伽瓶和两个与之相关的碗型器可能是用于皇家的灌顶仪式，或者至少是在地宫中象征这种仪式。灌顶是佛教密宗为初信者举行的仪式。经过这种仪式，信徒便与某个神祇心心相印。在仪式上，瓶中的香水被金刚杵赋予法力，用以为信徒施洗。

双鸿纹海棠形盒874年之前银鎏金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这盖盒捶击成型，盖子中心的纹饰为一对展翅的鸿雁，双鸟的羽毛等细节再以錾刻描绘。在中国鸿雁被视为爱情忠贞、婚姻专一的象征。银盒原本可能用于存放药品或化妆用品；出土时，盒内尚遗留着一块干固的香脂。

双狮纹银盒860—73年银鎏金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银盒装饰精美，底座呈喇叭型，尽显皇室气派。盒盖双狮与蔓草的纹饰，与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的铜镜图案相似。盒面錾刻的细密圆点是唐代金属器物的一种装饰特色。

法门寺石室出土的许多精品(如银盒)为来自中国南方的贡品。晚唐时期，江南地区奢侈品专业化生产，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发展与繁荣。

银羹碗子873年之前银鎏金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羹碗由素面碗子、沙漏状的碗托以及盖子三部分组成。盖面饰四朵如意云，云头镂空以便香气逸出，其设计与整体图案相得益彰。

公元873年，懿宗皇帝将此羹碗赠予佛寺，以表达他对佛祖的崇高敬意。

【展柜13】 **熏炉并炉台**869年银鎏金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香炉由几个独立的部件组成，装饰精美。图案设计颇受中亚艺术品的影响。

在法门寺地宫，香炉被置于中心位置。燃香是源自中国古老的宗教仪式，也常见于印度宗教仪式。上香是佛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香炉常饰以盛开的莲花图案。

【展柜14】 **双鸾团花纹大银盆**874年之前银鎏金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这大银盆是法门寺石室出土金银器中最为华丽精美的一件，也是至今发现最大的唐代金银器皿之一。银盆饰以成双成对的鸳鸯，衬以浮云和阔叶石榴。鸳鸯和石榴在中国寓意婚姻美满，子孙满堂。

银盆先由地方官员进贡给朝廷，再由僖宗于公元874捐给佛寺供奉舍利。此盆的贵重彰显了皇室对于宗教的虔诚。器物体型壮观，可能用于洒净仪式或作为浴佛圣物的器皿。

【展柜15】 **如意长柄手炉**872年银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手炉由小火盆和长手柄组成，手柄助于传导热量。炉柄底部的篆刻表示，这件手炉附有一件“香宝子”（即存放香料的器皿），因此这器物也可能用于熏香。

香炉并碗盏874年之前银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素面香案874年之前银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展柜16】这几件器皿是唐代遗存配套最为齐全的茶具中的一部分。据《物账碑》记载，这批茶具大部分应由僖宗于874年赠给法门寺。以茶具供养佛舍利显示了茶在当时社会的崇高地位。

六朝时期（公元222至589年），饮茶的习惯限于中国南方，但这种风尚很快便传播开来。到了9世纪，饮茶已成了中国各地普遍流行的风气。许多寺院也会栽种茶叶，其中一些寺院还会将茶叶进贡朝廷。饮茶可提神醒脑，助于僧侣静坐冥思，而被唐代寺院（尤其禅宗）推崇。

鸿雁流云纹茶碾子869年银鎏金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茶碾子是碾碎饼茶用的工具。这件茶具不仅仅是实用器也是精致的艺术品。此鎏金茶碾子为宫庭内的制作机构文思院所造，是至今发现最为精巧的唐代茶碾。碾子底部和碾轴均刻有“五哥”两字，表明此器为唐僖宗供奉。法门寺有几件茶具上都标有“五哥”的字样。“五哥”为唐懿宗的第五子，唐僖宗的乳名。

飞鸿毳路纹银笼子874年之前银鎏金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该飞鸿毳路纹呈桶形银笼子充分表示了唐代工艺精美、装饰典雅的风貌。本器物为法门寺中两件金属笼子之一，为存放茶饼的容器。镂空的毳路纹似花瓣的设计同时也具通风散热的功能。本件原为皇室贡品但因工艺精美而捐赠予法门寺。

龟形银盒874年之前银鎏金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龟形器以背甲作盖，作贮藏茶末之用。此容器形象逼真，类似的例子过往未曾发现。其朝首上仰，尾巴卷曲，趣致写实。金银相间的身躯与刻劃細膩的龟甲，增强了物像的质感。

素面银盐台874年之前银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盐为公元8至9世纪中国饮茶时的主要调味品。据陆羽的《茶经》记载，盐在加入茶末之前，先洒进沸水中调味。作为唐代茶具组件之一，此银器恰好证明食盐在唐朝茗茶习惯的重要性。

【展柜17】 **秘色瓷瓶**874年之前瓷法门寺宝塔下之中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这瓶子与《物账碑》中明确记载为“秘色”瓷的13件瓷器有着相近的釉色，因此也被视为秘色瓷的标本。唐代以及后期的诗人经常赞颂秘色瓷，将它清纯光润的色泽比作“千峰翠色”和“嫩荷涵露”。但人们仍然对秘色瓷感到迷惑，直到法门寺石室发现实例后，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才终于揭晓。

秘色瓷产于浙江省北部的越窑。陶匠利用最佳的胎土和严谨的烧造技法制作这些上等的瓷器。秘色瓷作为供奉佛舍利的御用品之一，表明了它在晚唐社会的崇高价值。

这件八棱瓷瓶是石室中出土的16件瓷器（14件青瓷与2件白瓷）之一，但造型与其他13件青瓷（即碗和盘）截然不同。出土时，瓶内装着五色宝珠29颗，瓶口有一大珠覆盖，因此推断可能用于某种宗教仪式。

八瓣团花盘

或为伊朗或叙利亚，874年之前

琉璃，描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玻璃古代也称琉璃。法门寺石室出土12件器型完整的蓝琉璃盘，此盘为其中的一件。盘身以刻纹作装饰，这种刻纹工艺乃伊斯兰玻璃匠从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工艺之一，在伊斯兰早期流行一时，此盘或许是阿拔斯帝国（公元750年至1258年）时期的伊朗地区所制作。中国从西方进口玻璃的历史可追溯至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除了伊斯兰玻璃，罗马及萨珊生产的玻璃器在中国各地时有出土。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在唐代，通过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玻璃器对当时人们来说是充满着异域风情且弥足珍贵的。西方玻璃器比起中国玻璃器更受青睐，因为相较于西方玻璃器，中国玻璃器更易碎且透视度不高。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瓶子

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或为7或8世纪

琉璃

法门寺宝塔下之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当这件瓶子在地宫中被发现的时候，瓶内曾放置有两行墨书的纸笺一张，现仅可辨识“莲”、“真”二字，其余均残缺。莲花是佛的象征，且根据地宫出土的物账碑记载，佛舍利被称为“真身”，这意味着此瓶有可能曾经用来盛放佛舍利。琉璃瓶亦可见于其他唐代遗址。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此器形与萨珊王朝制作的银器具关系密切。224至651年，萨珊王朝统治伊朗及邻近地区。瓶子最宽处呈H形装饰，可能是兽皮或人像图案。此装饰手法同见于6至8世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制作的琉璃器皿上。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18]

《志文碑》

874年

墨迹拓本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由唐代安国寺僧侣曾澈撰写。碑文追溯唐朝历代皇帝礼佛的历史沿革，包括记录了873年于长安迎奉佛舍利的盛况，唐懿宗之离世，以及874年舍利归还法门寺等事迹。

《物账碑》

874年

墨迹拓本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此碑题为《监送真身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账》。据勘验证实，碑文记录了地宫所藏绝大部分的文物，亦详载了奉献者与供物品类、数量等重要文字讯息。其中最大规模的供奉真身仪式，为873年懿宗在长安举办的礼佛盛典；另一次则在874年，僖宗在法门寺地宫封存前举行。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展柜19]

白玉棺

约871年

玉

法门寺宝塔下之秘龕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这只白玉棺是五重宝函中的最内层，原藏于法门寺宝塔地宫内后室的密龕中，被认为用以装殓真身指骨舍利。玉棺由一整块玉石雕刻而成，简洁的设计凸显出材质本身的细腻和光洁。自新石器时代起，中国就有以玉为礼器和葬具的传统。玉石还被应用在求仙、炼丹等活动中。玉所具有的超自然属性在佛教中被演绎得更为复杂。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四十五尊造像盃顶宝函

871年

银鍍金

法门寺宝塔下之秘龕出土。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被普遍认为是释迦牟尼佛指骨的真身舍利被置于五重宝函之中。此鍍金宝函为其中的第二重，也是全套宝函中装饰最为精美的一件。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宝函的表面鑿有佛教密宗根本两部之一的金刚界曼荼罗。每面分别鑿刻主持宇宙各方的五方佛，并在各佛周围鑿刻诸菩萨及明王。函盖上的主尊大日如来，在密宗中地位显赫，甚至超越了释迦牟尼，成为密宗尊奉的核心。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宝函正面鑿有“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铭文一行。作为中国出土的第一件带金刚界曼荼罗图像的文物，此函亦是记录晚唐佛教的一件重要历史遗物。

[展柜20]

塔式罐

约710年

陶

1995年富平县唐节愍太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舍利塔是佛教重要的建筑结构，佛教寺院多将佛舍利供奉于佛塔里。在佛教的历史记载中，早就有小型舍利塔或佛塔的记录。塔式罐是唐代时期才出现的随葬品，出土于皇室和平民的墓穴，在中国北方尤其普遍。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这件塔式罐盖钮的造型与印度舍利塔和中国佛塔顶部的设计相似。塔式罐由盖、罐和底座三部分组成。中国墓葬中列入塔形罐不仅表示死者的虔诚，也含有随佛悟道的愿望。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21]

药师如来像

7世纪晚期或8世纪

石

1950年麟游县九成宫太平寺遗址出土。麟游县博物馆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通过这尊佛像手持之残钵，可辨识此像为药师如来，设药除灭病痛之佛。此佛像面相丰满圆润，衣褶流畅自然，乃典型唐代造像风格。药师如来全称“药师琉璃光如来”，是东方净土琉璃世界的教主，除接引众生往生极乐，也救度幽明众生于苦难。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展柜22]

塔式罐

7世纪晚期或8世纪上半叶

彩色陶

1988西安市长安区郭杜中纬工地出土。西安博物院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塔式罐外表常施三彩釉或彩绘。此罐先在陶胎上施一层化妆土后再上彩，化妆土能遮盖陶胎上的瑕疵及令底色较均匀，使彩绘更显亮丽。

[23]

马头明王像

约800年

大理石

1959年安国寺旧址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此马头明王像于安国寺旧址出土。安国寺与唐长安城的东市毗邻，是唐代重要的密宗寺院，曾吸引无数僧人到访研习佛理。与此像同时出土的还有另十件神像。这十一尊雕像应该都属于当时寺里同一组曼荼罗。从此尊马头明王生动的造型，人们可以想见这组神像充满活力，威力无边，但如今要复原此组轨已不可能。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马头明王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呈现出忿怒相。他恐怖的形貌和凸出的双目、上翻的獠牙，都是为了降魔除障，净化佛教信仰。此像头上原有一只马头，现已残。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展柜24]

舍利石函

7或8世纪

大理石

1989年蓝田县蔡拐村出土。蓝田县文物旅游局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此舍利石函出土于西安南部终南山的唐代法池寺故址。当时的终南山拥有48座佛教寺院，为厌倦官场的政治人物提供了一个清幽的避风港。函身四周浅浮雕佛家涅槃图，这类图案在唐代舍利函装饰上相当普遍。唐法池寺有位智衍法师专事讲解涅槃佛经，这或与此石函上的图案有些渊源。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这一面浮雕描绘了拘尸那揭罗王会见各国代表，并同意把佛祖的舍利子分为八等分。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舍利石函[续]

这一面浮雕描绘了两支前往拘尸那揭罗城的队伍。佛陀涅槃后，邻近各王国都要求分得佛陀的遗物。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舍利石函[续]

这一面浮雕描绘了佛陀准备前往拘尸那揭罗城进入涅槃时，有500名力士在清理道路。路上有大石挡路，力士们无法移开路上的大石，佛陀于是以脚趾轻易地把大石顶向空中，以右手接着并用口吹碎大石，过后佛陀再把大石复原。佛陀以大石的易变来比喻人生无常的法则。力士们见此而对自身力量的骄傲自满感到羞愧。

法门寺出土的八瓣团花玻璃盘

这一面浮雕显示左边路上为迎送佛陀舍利的行列，身着唐代服饰的侍卫挑着以布帘覆盖的棺木。佛门子弟则随行在侧。

高髻仕女俑

或为8世纪

彩绘陶

1987年陇县东南镇出土。陇县博物馆

刀髻仕女俑

约663年

彩绘陶

1997年昭陵新城公主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考古学家在新城公主（唐太宗第二十一女）的陵墓中发现了293个陶俑。其中九件女性人像饰有初唐风行的单刀半翻髻发型。

【展柜36】调鸟仕女图

约727年

泥灰

2004年富平县唐嗣虢王李邕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壁画在唐朝开始盛行，用于装饰宫廷、庙宇、道观及陵墓。陵墓中的壁画往往反映了往生者的一生，包括出行的仪仗队伍、享乐的追求及舒适无忧的生活。此幅画与描绘马球活动的壁画同出一墓。

【展柜37】腰鼓

741年左右

彩绘陶

2000年蒲城县惠陵李宪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杯

8或9世纪

三彩胶胎陶

2003年西安市长安区紫薇科技园区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碗

7世纪晚期或8世纪

三彩釉陶

1972年礼泉县烟霞镇越王李贞墓出土。昭陵博物馆

碗

8世纪

三彩釉陶

1989年西安市东郊国棉五厂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折腹碗

8或9世纪

瓷

1989年西安市东郊国棉五厂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折腹碗

或为8世纪

银

1971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大唐”款素面圆盒

7或8世纪

银

2002年西安市长安区出土。西安博物院

六曲杯

或为8世纪

玻璃

兴平博物馆

龟背纹盒

9世纪

银

1979年西安市碑林区西安交通大学出土。西安博物院

银器设计简约，重点放在比例与形态上。盖子线条稍微凸起，使盒子形成类似龟的形状。这类文物反映了唐人对外观素雅的金银器之喜爱。

这些金银器估计用来调制长生不老的药，皆因人们相信当银器里的物质溶进汤药里，会对身体有益。

渣斗

7或8世纪

银

1988年西安302工地唐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展柜38】

唐代铜镜产量大增，供海内外销售。唐墓里经常发现铜镜，高质量的铜镜更是朝廷贡品。

瑞兽葡萄纹镜

7世纪晚期或8世纪早期

铜

1972年宝鸡收购。陇县博物馆

瑞兽葡萄纹镜

7世纪晚期或8世纪早期

铜

1979年西安市文物商店移交。西安博物院

葡萄藤是唐朝铜镜常见的纹饰。当时人们对国外事物深感兴趣，葡萄这种异国水果经丝绸之路从中亚传入中国。此设计灵感源于古代地中海地区。

十二生肖八卦纹镜

8世纪

铜

西安博物院

以十二生肖象征十二地支盛行于唐代。人们将十二生肖与代表四季、五行的八卦结合，设计成八卦镜，相信能挡灾避邪。

螺钿镜

736年之前

铜、螺钿、漆、绿松石

2002年西安理工大校区李倕墓出土。陕西考古研究院

真漆在唐朝除了作物品的背景添色，也用来巩固嵌饰。展示中的镜子以真漆巩固嵌饰，并加入绿松石点缀。珍珠母经精巧的刻工后构成莲花图案。色彩鲜艳加上材质繁多，使镜子闪亮夺目。

八瓣形狩猎纹镜壳

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中期

银

1981年西安市第一建筑公司出土。西安博物院

花瓣形镜子具有深远的中华文化意义，在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中期尤其流行。另外，刻画打猎情景的图案在中国及中亚的工艺品也普遍常见。

八瓣形四鸟花卉纹镜

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中期

铜

1955年西安市长乐坡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展柜39】“官”字款盘三件

9世纪晚期或10世纪

瓷

1985年西安市火烧壁村出土。西安博物院

这几件盘的造型为花瓣状，轻薄的胎体效仿捶打成形的银质器皿，十分秀雅。唐代瓷器的造型普遍效仿金属器皿，是当时陶瓷工艺的特色之一。

高温烧造成型的白瓷是唐代北方窑场的重要成就。这三件盘子出土于西安邻近的一个村庄，原本藏于一个大陶罐内。罐内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包括这三盘）共32件。“官”字款表明这批瓷器应属官僚用品，而非平常百姓之器物。